

湖北恩施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黄思杰, 钟文娟, 陈敏, 帅宇曦, 朱佳慧

(武汉轻工大学医学与健康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23)

摘要:目的 研究民族地区农村老年人的抑郁症状及其影响因素, 为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的预防和改善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取便利抽样的方法于 2020 年 10 月-2021 年 8 月对 361 名恩施州利川市农村老年人进行调查, 分别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和家庭关怀度指数测评量表(APGAR 问卷)评价其抑郁症状和家庭功能。结果 恩施农村地区老年人 SDS 平均标准得分为(51.72±6.91)分, 抑郁检出率为 60.90%。单因素分析显示性别、有无配偶、是否满意经济收入、慢性病患病情况、家庭功能对老年人 SDS 平均得分有显著性影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而多元回归分析表明, 女性、对经济收入不满意、患慢性病、家庭功能较低是影响农村老年人抑郁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 提高经济收入与物质条件、积极预防和治疗慢性病、改善家庭功能等措施有利于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的防治, 且无配偶、女性应为所关注的重点人群特征。

关键词: 少数民族; 农村老年人; 抑郁症状;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R749.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6-1959.2024.12.012

文章编号: 1006-1959(2024)12-0060-04

Analysi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mong Rural Elderly in Enshi Minority Areas of Hubei Province

HUANG Si-jie, ZHONG Wen-juan, CHEN Min, SHUAI Yu-xi, ZHU Jia-hui

(College of Medicine and Health, Wuh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an 430023, Hube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elderly in ethnic areas,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improvemen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of rural elderly. **Methods** From October 2020 to August 2021, 361 rural elderly in Lichuan City, Enshi Prefecture were investigated by convenience sampling. The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and the Family Care Index Scale (APGAR questionnaire)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ir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family function. **Results** The average SDS standard score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of Enshi was (51.72±6.91) scores, and the detection rate of depression was 60.90%.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gender, spouse, satisfaction with economic income, chronic diseases, and family function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average SDS score of the elderly, and the differenc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women, dissatisfaction with economic income, chronic diseases, and low family function were risk factors for depression in the rural elderly ($P<0.05$). **Conclusion** Measures such as increasing economic income and material conditions, actively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chronic diseases, and improving family function are conducive to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rural elderly people, and no spouse and women should b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Key words: Ethnic minority areas; Rural areas; Depressive symptoms; Influencing factors

我国自 1999 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 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数的比例持续增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2.64 亿, 占总人口数的 18.70%^[1], 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也越来越影响着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抑郁作为一种老年人群中常见的精神障碍, 会损害老年人的精神、躯体状

况, 增加老年人残疾、自杀的风险, 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严重负担。研究表明^[2], 社会人口学因素、生活方式、身体状况均会影响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发生。目前, 我国关于老年人抑郁症状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 而我国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由于地理位置远离经济中心, 相较于城市地区的社会资源更加匮乏, 经济、医疗条件更为落后, 这使得少数民族农村地区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通常没能得到及时的关注和有效的干预, 抑郁症状的发生比城市老年人更为普遍和严重^[3]。因此, 对民族地区农村老年人以抑郁为代表的心理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刻不容缓。本研究以恩施州利川市的农村老年人为对象展开调查, 探讨民族地区农村老年人的抑郁症状发生

基金项目: 湖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 21Y130)

作者简介: 黄思杰(2000.2-), 女, 湖北武汉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研究

通讯作者: 钟文娟(1964.7-), 女, 湖北武汉人, 博士, 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研究

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的防治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于 2020 年 10 月-2021 年 8 月在恩施州利川市抽取农村老年人进行调查,纳入标准为:①年龄 ≥ 60 岁;②属于恩施州利川市农村常住人口;③意识清楚、语言沟通顺畅;④自愿配合本调查。实际得到有效问卷 361 份。

1.2 方法 在征得调查对象同意后,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对其进行面对面的调查。调查内容包括:①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年龄、性别、有无配偶、民族、是否满意经济收入、慢性病患病情况、家庭功能。②家庭关怀度指数量表(APGAR):该量表由美国华盛顿大学的 Smilkstein 医师编制,总分在 7~10 分为家庭功能良好、4~6 分为家庭功能中度障碍、0~3 分为家庭功能严重障碍^[4]。③Zung 抑郁自评量表(SDS):量表共包含 20 个条目,要求被试者根据过去一周的真实状态选择相应的选项,每个选项对应不同分值,最后将总分按照规定计算方式转换为标准分后进行统计分析,标准分 >53 分被判断为有抑郁症状,标准分 ≤ 53 分为无抑郁症状。以总分/80 计算抑郁严重指数:0.50~0.59 为轻度抑郁、0.60~0.69 为中度抑郁、0.70 以上为重度抑郁^[5]。

1.3 统计学方法 以 Excel 2019 建立数据库,采用 SPSS 26.0 进行统计描述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bar{x}\pm s)$ 描述,单因素分析采用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比进行描述。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双侧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及单因素分析 本研究共调查 361 名老年人,年龄 60~95 岁,平均年龄 (71.24 ± 6.83) 岁。其中男性 193 人,女性 168 人。全样本 SDS 得分为 35.00~72.50 分,平均值为 (51.72 ± 6.91) 分,高于全国常模 SDS 得分的平均值 (41.85 ± 10.57) 分^[6];抑郁症状总检出率为 60.90%,其中轻度抑郁检出率为 44.60%、中度抑郁检出率为 15.20%、重度抑郁检出率为 1.10%。按照年龄、性别、有无配偶、民族、是否满意经济收入、慢性病患病情况、家庭功能对调查对象进行分组比较,发现性别、有无配偶、是否满意经济收入、慢性病患病情况、家庭功能这 5 个因素对 SDS 得分有显著性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中,女性较男性、无配偶者较有配偶者、对经济收入不满意者较满意者、罹患慢性病尤其是慢病共病者、家庭功能较差者 SDS 得分均更高,见表 1。

表 1 不同因素分组老年人 SDS 得分的比较 $(\bar{x}\pm s, \text{分})$

因素	<i>n</i>	得分	统计值	<i>P</i>
年龄(岁)	60~	51.19 \pm 7.48	<i>F</i> =1.465	0.232
	70~	51.83 \pm 6.18		
	80~	53.15 \pm 7.20		
性别	男	50.46 \pm 5.99	<i>t</i> =-3.797	0.000
	女	53.18 \pm 7.60		
有无配偶	有	51.37 \pm 6.73	<i>t</i> =-2.123	0.034
	无	53.38 \pm 7.50		
民族	汉族	51.78 \pm 7.77	<i>t</i> =0.165	0.869
	少数民族	51.66 \pm 5.95		
是否满意经济收入	满意	51.33 \pm 7.12	<i>t</i> =4.443	0.000
	不满意	53.54 \pm 5.49		
慢性病患病情况	不患慢性病	48.91 \pm 5.90	<i>F</i> =31.005	0.000
	单一慢病	50.32 \pm 6.31		
	慢病共病	54.98 \pm 6.80		
家庭功能	良好	50.28 \pm 6.04	<i>F</i> =5.802	0.003
	有一定障碍	52.43 \pm 7.35		
	严重受损	52.97 \pm 7.28		

2.2 民族地区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以是否抑郁作为因变量,以性别、有无配偶、是否满意经济收入、慢性病患者情况、家庭功能这 5 个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

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仅性别、是否满意经济收入、慢性病患者情况、家庭功能这 4 个因素引起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抑郁症状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因素	回归系数(B)	标准误	标准系数(β)	t	P
常量	46.086	2.416	/	19.073	0.000
性别	1.794	0.676	0.130	2.652	0.008
有无配偶	0.423	0.878	0.023	0.482	0.630
是否满意经济收入	-3.132	0.861	-0.173	-3.637	0.000
慢性病患者情况	2.793	0.409	0.330	6.821	0.000
家庭功能	1.265	0.404	0.148	3.127	0.002

3 讨论

本研究中民族地区农村老年人 SDS 平均得分高于全国常模^[6],老年人抑郁症状检出率为 60.90%,高于李磊等^[7]、刘丹丹等^[8]、陶慧文等^[9]基于 CHARLS 数据计算得出的中国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且中重度抑郁症状检出率较高。从整体上看,本研究中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的患病情况较为严重,表明民族地区农村老年人的抑郁问题应当引起高度关注。

统计结果显示,女性 SDS 平均得分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农村老年人的抑郁程度存在性别差异,且农村老年女性抑郁患病率相比于男性较高,这与王丽等^[10]的结论相一致。一方面,这可能与老年女性相较于男性更多的暴露于生理性、社会性,以及经济性的抑郁危险因素有关。例如:由于男女体质不同,女性更容易受到生理方面不良因素的危害,患病和失能的可能性更大,而身心健康往往密不可分;且在封建落后的传统观念下,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衡导致了农村老年女性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收入更低^[10],女性通常承担着较多的家务劳动而缺乏社会活动的参与,男尊女卑的社会风气使得农村女性的情绪长期处于压抑状态。另一方面,也可能与男女对压力源的易感性不同、生活习惯,以及认知情绪调节方式的差异有关^[11,12]。女性的感情细腻,对压力源的感知较为敏锐^[10],在面对负性生活事件时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采取理性的、积极的认

知情绪调节方式^[11],且男性往往会通过适量的吸烟、饮酒等行为方式来缓解自身的不良情绪从而减少抑郁症状的产生。此外,对经济水平满意的农村老年人 SDS 均分高于不满意经济水平的老年人,表明物质条件、生活水平高低对老年人的心理状况有着显著的影响。慢性病普遍存在于老年人群中,其患病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升高,罹患慢性病尤其是多种慢性病将会严重影响到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甚至提高抑郁患者自杀的风险^[13,14]。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15,16],本研究发现罹患慢性病是老年人出现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且患慢性病数量能够正向预测老年人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家庭功能与老年人抑郁症状有关,家庭功能良好的老年人 SDS 平均得分高于家庭功能严重障碍的老年人。既往研究也表明^[17-19],家庭功能对老年人的抑郁情绪有着显著影响,家庭为老年人提供的精神和生活照顾能有效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其对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影响甚至可追溯到童年时期,童年时期遭遇越多家庭功能障碍者,其老年时期产生抑郁情绪的倾向越大。这提示我们要重视家庭成员对老年人情感诉求的态度、与老年人保持正向且有效的沟通,营造温馨且愉悦的家庭氛围。此外,大多数针对老年人的抑郁症状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城市地区^[20,21]。然而,由于社会资源的匮乏,相较于城市老年人,农村老年人的抑郁症状通常更严重,抑郁检出率更高。本研究中民族因素对该地区农村老年人的

抑郁症状没有显著影响,与曹显明^[21]的研究结果不同,可能是由于生存环境的同化作用超过了民族差异所造成的影响所导致的,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需进一步探索。

综上所述,应加强对农村老年人抑郁问题的重视,在临床诊疗的同时还应多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存在经济收入较低、患慢性病、家庭功能低下、无配偶、女性等特征的老年人应是关注的重点人群。家庭成员应加强对老年人的关心爱护、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村委会可根据情况按时为中老年人开展精神卫生宣教、提供心理咨询、心理辅导等服务、积极预防及改善农村老年人抑郁情况。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人口年龄构成情况[J].中国统计,2021(5):10-11.

[2]李方,李梅,王莹.中国老年人抑郁症状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22,49(4):612-615.

[3]孔宪焜,肖巧玲,李娟.老年抑郁症状相关因素的城乡比较[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8,32(8):648-655.

[4]Smilkstein G.The family APGAR: a proposal for a family function test and its use by physicians [J].J Fam Pract,1978,6(6):1231-1239.

[5]Zung WW,Richards CB,Short MJ.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in an outpatient clinic. Further validation of the SDS [J].Arch Gen Psychiatry,1965,13(6):508-515.

[6]王春芳,蔡则环,徐清.抑郁自评量表——SDS对1340例正常人评定分析[J].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1986(5):267-268.

[7]李磊,马孟园,彭红叶,等.中国农村地区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情况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全科医学,2021,24(27):3432-3438.

[8]刘丹丹,刘习羽,刘慧敏,等.中国农村老年人抑郁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郑州大学学报(医学版),2021,56(5):648-652.

[9]陶慧文,张晓,汪圳.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农村老年人抑郁状况及影响因素[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18,22(7):696-699.

[10]王丽,张晓.我国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性别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18,22(11):1148-1151.

[11]胡杰容.老年抑郁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机制[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9,31(4):64-73.

[12]罗晓,徐斌,胡红星.抑郁障碍患者情绪调节的性别差异[J].新疆医学,2022,52(7):753-756.

[13]阎红,刘书文.慢性病老年人心理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9,39(21):5366-5369.

[14]樊荣,李小菊,董嘉鑫,等.中国农村老年人慢性病对抑郁症状的影响——日常活动能力的中介效应分析[J].现代预防医学,2023,50(5):859-864.

[15]冯强伟,王取南,杨林胜,等.六安市城乡社区老年人抑郁症状及其与慢性病的关联性研究[J].现代预防医学,2018,45(20):3731-3734,3747.

[16]蒲嘉欣,张静.老年慢性病患者焦虑与抑郁影响因素分析[J].社区医学杂志,2018,16(23):1701-1704.

[17]李惠萍,梁丰,宋江艳.合肥某社区老年人抑郁与家庭功能状况的相关性[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2,32(1):162-163.

[18]杜本峰,耿蕊,穆跃瑄,等.童年家庭功能障碍对老年人抑郁倾向的影响贡献、累积效应与作用机制[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22,15(1):64-71.

[19]蒲玉翠,梁聪,董乐,等.社区老年人抑郁症状影响因素及拐点年龄分析[J].护理研究,2023,37(10):1719-1723.

[20]王红艳,吴萍,林琴,等.成都市社区老年人抑郁症状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华全科医学,2018,16(9):1500-1503.

[21]曹显明.黔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留守老年人群心理卫生问题及对策思考[J].贵州民族研究,2018,39(8):50-54.

收稿日期:2023-07-03;修回日期:2023-07-26

编辑/肖婷婷